

借鉴传统廉政文化 助推当代廉政建设

罗新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形势下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传统廉政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而成的关于廉洁从政的知识、信仰、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及社会评价的总和。传统廉政文化总体可以分为理念、制度、物质和行为四个层次。这四个层次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成为我国古代治国理政、为官从政、个人修养的核心脉络。深入挖掘传统廉政文化资源并汲取营养,对于当前建设廉洁政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培育廉政理念:从“义利之辨”到“廉洁自律”

以廉为本是传统廉政文化的核心。那么,如何做到以廉为本呢?古代先贤强调通过义利之辨,树立“以廉为基”的利益观。儒家学者认为义利关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基本矛盾,也是人生应该解决的首要问题。程颢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唯义利而已。”朱熹说过:“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可见义利观是传统文化中核心价值观。《孟子·告子上》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尽心章句下》:“养心莫善于寡欲。”很明显,孔子、孟子的价值取向重义而非利。“义”,是满足欲望、获取财富的前提。当然这些思想并不笼统排斥财富(利),也不拒绝绝对意义上的财富,而是要以道义作为价值尺度。宋明时期,义利之辨发展为理欲之辨。朱熹在解释古代“道心唯微,人心唯危”时认为,如果人心“无所主宰,流而忘返”,就会危害社会。所谓“道心”就是人的道德意识与理性,“人心”就是指个人与生俱来的感性欲望。朱熹认为要使“人心”不泛滥以致于危害社会,就要用“道心”主宰“人心”,也就是欲望应当受道德原则的约束。可见,重义轻利、崇义非利一直是中国理性的道义,是约束古代义利之辨的主流观点。

传统廉政文化中的义利之辨对于今天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前,面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肃查处腐败分子,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不敢腐”主要靠法治,“不能腐”主要靠制度约束,“不想腐”则要靠教育和道德约束。“不敢腐、不能腐”属于外在条件制约,“不想腐”则属于内在精神自律。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而言,一定要树立正确的利益观、财富观。马克思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础则是人类精神的他律。”律,法也,引申为“约束”。自律,就是自我约束。

“贪如火,无制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必滔天。”人一旦私欲萌动而得不到遏制,就会渐渐吞噬人的心灵,天长日久则使人丧失理性。因此,作为党员

领导干部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身修养,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努力做到廉洁自律。

二、端正廉政取向:从“民惟邦本”到“为人民服务”

《尚书·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句话告诫我们,人民只可以亲近,不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而轻视人民。人民才是国家的根本所在,人民稳固则国家安宁。《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梁惠王下》:“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在孟子的政治观念中,在政治生活中人民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次之,为政者则处于较轻的地位。执政者应以民心向背为施政之基。“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重要哲学依据,淡化了中国文化“君权神授”的迷信色彩,限制了执政者滥用权力的行为,成为古代社会秩序建构的价值取向和理论支撑,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和谐及政治稳定。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中国共产党必须树立正确的执政价值取向,才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首先,树立以廉为本的执政意识。以廉为本是执政之要。通过创新理论学习、宣传教育方式,大力弘扬传统廉政文化中以廉为本的执政意识,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只有始终坚持以修身为本,真正做到“内省”、“慎独”,才能在工作岗位上勤政务实,清白做人。其次,树立敬德保民的公仆意识。群众路线是执政之基。借鉴传统廉政文化中的亲民、保民思想,就要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自觉树立公仆意识,牢记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认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第三,树立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等更加突出地摆在党的面前。借鉴传统廉政文化中民为邦本思想,就要要求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能够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前提下,坚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加强党的队伍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的执政安全,确保人民利益的实现。

三、创新廉政模式:从德治主导型到德法并重

传统廉政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文化,是一种以“内圣外王”为目标的伦理型政治文化,在廉政模式上,表现为“德主刑辅”的廉政模式。提倡德的主要地位并不是指传统廉政文化不重视法或者制度建设。相反,在制度建设上,传统廉政文化也具有丰富的内容。一是廉政的法律制度。《史记》记载,舜帝时,曾“鞭作官刑”。《韩非子·六反》中有:“明主之治国也,众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唐朝的《唐律疏议》还是现存的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完整的法典,提出了防患结合的廉政措施。二是官吏选拔任用和管理制度。

主要包括西周“六廉”制度、秦汉时期的官吏“试守”制度、汉代的察举孝廉制度、隋唐之后的科举制度以及宋代的官吏任回避制度等。四是监察机构及制度。监察机构的设置分为中央政府的监察机构和地方政府的监察机构,并构成自上而下的监察系统,监察机构处于相对独立于行政机构的地位,两者各司其责,互不统属,实现了行政权和监察权的分离。监察官员地位高、职权大,实行上下垂直领导,不受地方长官约束,直接对皇帝负责。由此可见,制度建设是传统廉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廉政的根本保证在于法制。邓小平指出:“廉政建设,要靠教育,也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当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应着力加强三个方面:一是建立完善的廉政制度体系。借鉴传统,立足现状,立法、行政、司法、审计、监察等各级职能部门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廉政制度体系,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从源头上消除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权力寻租的可能性。二是牢固确立“以廉为首”的干部用人导向,建立“以廉为首”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就是注重干部的廉德,并把它纳入到干部的选拔和考核中,作为干部任命、考核的根本依据。要加强廉政立法,不断完善相关法规,建立完备的廉政法规体系。比如,可以针对公职人员行使权力中的利益冲突问题,制定《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法》,有效规制公职人员廉洁从政。三是建立统一的反腐败机构。传统廉政文化中的监察机构启示我们,要对各个反腐败机构进行整合,建立一个独立、权威、专门的反腐败机构,增强公众对反腐败的信心。同时,要加大腐败成本,形成“不敢腐”的高压态势。德法并重模式,强调德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思路,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加大了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力度。

四、倡导廉政作风:从“修齐治平”到“三严三实”

传统廉政文化的行为层面包含公职人员秉持廉政理念而在为政、治国以及社会交往中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如工作方式、生活习惯、言谈举止等。传统廉政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廉政思想。明朝钱琦说:“居官者,则自廉。”意思是说当官的人,做事情的时候保持公平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廉洁。为官者公平办事,公平执法,不偏不倚,是廉洁的重要行为方式。要教育官员廉洁,必须让他们做到公平正行为节俭。可见,廉政文化不仅是一种认知,更强调一种行为方式,正如古人所讲“践廉于行”。为政者只有率先垂范,做事正派,才能实现廉洁执政,建设廉洁政治。

儒家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程序,将道德价值扩展到政治价值,充分明确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相互关系。“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被朱熹称为《大学》“三纲领”。“三纲领”是古人修齐治平之要,明明德是个人德性修养之学,亲民是为政者治平实践之学,止于至善是人们要达到的崇高境界,蕴含着丰富的“廉”思想。古人说“践廉于行”,为政者只有在行为中自觉践行“三纲领”,做人正派,做事正派,才能实现廉洁执政,打造廉洁政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三严三实”明确了领导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为加强新形势下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三严三实”的要求,抓住了党员干部从政的根本,明确了干事创业的准则,划定了为官律己的红线,是中央对党员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为干部加强修养、改进作风、健康成长指明了方向。作为“关键少数”的党员干部必须加强自身廉政修养,在执政行为中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才能达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至善”境界。

自1983年夏天9月份,我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就开始思想品德(思想道德修养)课的执教历程。三十年来先后给近三十届本科生、专科生、自考生讲授这门课程,累计重复讲授近100遍。回顾几十年的教学实践,感慨良多,要当好品德课教师,真正上好这门课,需要多方面的持续努力。

1.理论的探索与实践的把握、应用。思想品德课是伴随改革开放初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的时代要求而产生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综合运用各科知识分析大学生学习、生活与社会交往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引导大学生成长进步,是这门课的本质原则。在教学过程中贯彻这一原则是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的思想保障。而真正实践这一原则,既需要在备课过程中把革命导师、专家学者关于思想道德修养的相关理论论述,及这门课相邻的哲学、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及人才学等理论知识融会贯通,对教材中涉及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多学科的综合分析,揭示思想道德品质养成与人生成长进步的内在规律;同时还需要引导学生应用思想道德修养理论分析考察社会人生现象,关注并促进学生自身思想道德实践。教学过程中强调在“指导”“应用”上下功夫,用科学正确的思想道德理论指导学生健康成长,早日成才。

2.起点的切入和终点的追求。在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学中,从学生学习、生活与日常交往实际出发,从学生关注的现实问题入手,是展开这门课教学体系的切入点,而引导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实践中养成社会主义的优秀道德人格,是这门课教学体系的最终落脚点。而以学生为中心、促进学生健康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在课程内容实施及教学价值导向上就体现在“关心爱护学生”和“教育引导学生”的内在统一。我的经验体会是,关心爱护学生是展开教学的开端,在关心帮助学生解决实际困难中逐步渗入思想教育,使思想道德教育和在风细雨中显现出来,而随着与学生关系的密切,对学生实际情况的掌握,对学生逐步提高要求,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和学生校园生活实际,用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理论深入浅出地分析解剖社会现象,使学生分清是非善恶,从而在实际行动中弘扬正气,提升精神境界。

3.课堂理论解析与课外实践指导。思想道德品质的培养塑造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而作为其理论指导的思想道德修养课要完成这一使命就不能局限于每次的课堂教学范围,而是要把课堂教学与课后实践指导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一个动态过程中教育和培养大学生逐步形成科学的思想道德理念、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课堂教学侧重于理论讲解,以事说理,启发与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理念;而实践指导则侧重于情感熏陶、意志磨砺与行为习惯的养成,二者反映了教育的“内化”与“外化”两级目标。多年来,思想道德修养课的最终完成式。它既可以通过师生之间、同学之间个别谈心交流、集体性的座谈对话、辅导报告及课外阅读与观赏红色影视等思维方式进一步深化课堂教学,消除个别疑惑;也可以通过组织参观、访问、社会调查、参加公益活动、“心连心一献爱心”等实践形式引导学生认识社会人生,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主动地进行自我改造与自我锻炼。

4.潜心施教与修身养性。一个完整的教育过程是综合应用思想理论阐释与人格德行感召的情与理的交融。对思想道德修养课的教学来说,人格形象的感召力往往大于思想理论的说服力。思想道德修养课任课教师的行为既是个人心理品质的体现,又是对学生进行道德实践教育的典型样板,学生的许多思想言行往往是从老师的行为方式中学来的或受老师的启发;思想道德修养课所给学生的不仅仅是理论知识,更是一种行为方式和人生信仰。一个德育教师要引导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培育高尚的道德人格,教师自己首先得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具有高尚的道德人格。多年来,思想道德修养课的教学效果受到怀疑与指责,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一个内在原因就在于不少的任课教师是以“换饭吃”的谋生目的来对待这门课的教学,德育教育仅仅停留在对学生讲解一些知识与道理,而自己的内心信念和行为与实践所传授的思想理论严重脱节甚至背离,学生与社会大众由于对这些不合格教师怀疑而产生对这门课价值功能的怀疑。因此,一个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师要真正把这门课讲出风采,实现其应有的价值,最根本的是教师自己活出风采!正人先正己,修己方能安人,教师自己光明磊落、堂堂正正,才能理直气壮地教育引导学生,才能真正彰显思想道德修养这门课的正能量。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离退出这个心爱的讲台也就五六年的时光!时间紧迫,自己要做的就是珍惜这教师岗位的荣誉,更加努力地教学,不断修炼提高自己。当自己告别大学讲台时,才可以问心无愧的宣告:“我是一名光荣的德育课教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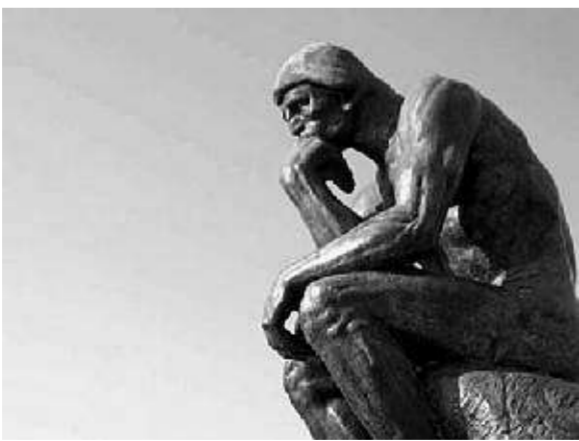


思想道德修养课执教有感

王有信

哲学与大学生

何为



哲学不是知识之学,而是智慧之学。哲学课教学理所应当的应教给学生智慧而不是知识。智慧是对待人生的一种境界,是观察分析问题的一种视角,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种方法。给大学生这个精英群体教授哲学,首先应该弄清一个问题:哲学与大学生的关系。只有明晰了这个问题,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说,才会将获取智慧从自发上升为自觉。

一、大学生之“大”

当我们思考什么是大学生的时候,自然会遇到一个问题,即大学生之“大”是何意?我觉得,首先,大学生之“大”不是大学之“大”,因为,不是只要在大学里上学就一定不是大学生;其次,大学生之“大”不是年龄之“大”,因为,不是年龄大的学生都是大学生。那么,

大学生之“大”是什么呢?我认为,大学生是相对中、小学生而言的,中、小学生都还是孩子,大学生却已经是“大人”,正因为如此,大学里相对自由的管理和教育方式已与中小学有天壤之别。所以,大学生之“大”是“大人”之意,即“成人”的意思,是心智的“大人”化。而成人与孩子的区别,主要表现为行为方式上的自主和思维方式上的成熟。成熟相对幼稚而言,通常人们用幼稚和成熟两个概念来区分孩子和成人,孩子的心智是幼稚的,大人的心智是成熟的。幼稚的思维方式是走极端、绝对化,成熟的思维方式是不走极端、不绝对化。比如,在观看文艺作品时,孩子对“好人”“坏人”的区分,界限清晰,不允许模糊,无法接受模棱两可,而成人就不会这样。从理论上讲,孩子的思维过程仅仅停留在遵循形式逻辑,而成人思维流程则已上升为遵循辩证逻辑。从哲学上讲,孩子的哲学叫“形而上学”,成人的哲学叫“辩证法”。

就此而言,“大学生”这个词的关键内涵之一是心智和思维方式成熟的学生。

二、哲学之功用

概念之,哲学的主要功用为:锤炼能力,塑造人格,滋养心灵,提升境界。

“锤炼能力”,就是通过研习哲学的过程,能训练研习者的逻辑思维。哲学的专职功能之一就是训练思维。思维能力包括理解力、分析力、综合力、比较力、概括力、抽象力、推理力、论证力、判断力等能力。它是整个智慧的核心,参与、支配着一切智力活动。人和人的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思维能力的区别。一个人聪明不聪明,有没有智慧,主要就看他的思维能力强不强。要使自己聪明起来,智慧起来,最根本

的办法就是培养思维能力。思维能力高低的区分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即是否具有创造性、系统性、深刻性、敏捷性和灵活性。哲学是思辨性、逻辑性、对话性最强的一门学问,通过研习,自然能够最有效地锤炼一个人的逻辑思维能力。

“塑造人格”,就是通过研习哲学,能培养研习者的高尚人格。人格有高尚低俗之分,弗洛伊德将人格划分为三个层次,即本我、自我、超我。认为“本我”位于人格结构的最低层,是由先天的本能、欲望所组成的能量系统,是无意识、非理性的,遵循快乐原则;“自我”位于人格结构的中间层,从本我中分化出来的,其作用是调节本我和超我的矛盾,遵循现实原则;“超我”位于人格结构的最高层,是道德化的自我,追求完善的境界,遵循道德原则。人格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后天养成。由于哲学特有的高屋建筑、宏观视野、高端大气的气质,使哲学对于塑造人格的高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滋养心灵”,就是通过研习哲学的研习,能丰富研习者的精神内涵。哲学,是承载人类丰富智慧的学问,研习哲学,就是在和崇高与伟大的灵魂进行对话。研习哲学,会让人在面对人生时,快乐勇敢,从容淡定、明智聪慧,内心强大、纯净高尚、丰富深邃。研习哲学,能够消除孤寂空虚,扫除暗淡阴霾。因此,研习哲学就能够从多方面滋养人的内心世界。

“提升境界”,就是通过哲学的研习活动,能升华研习者的人生境界。哲学乃提高人生境界之学(张世英语)。冯友兰先生说:“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冯先生甚至将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等

级,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认为:“哲学的任务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特别是达到天地境界。”

三、哲学对形成大学生之作用

大学生,不是跨入了大学之门就算合格的大学生,而是具备了成熟的心智和思维方式的学生。

一个人的心智从幼稚到成熟,其途径无非有两条:其一是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中摸爬滚打。如果,一个人没有上大学的历史或者没有经历过相当于大学学习的人生阶段,而是直接走向社会,那么,要真正使自己走向心智成熟,就必须通过参与一定的社会实践活动,形成一定的社会问题,进行一定量的人际交往,经历一定量的成功与失败的磨练,花费一定量的人生时段,付出一定量的人生代价。这条途径显然是“成本”很高的途径。其二是研习哲学,进行哲学训练。哲学的抽象、严谨、思辨、机智、深刻、高远的特征,以及“对话”的性质和终极关怀的境界,都是锤炼人的逻辑思维能力的最有效方法。当然,这一切需要掌握正确的原则。其核心点就是必须明白,不能把哲学当知识来学,而是要通过学哲学的过程进行思维训练。相比之下,第二条路径践行起来通常代价要小很多。因此,研习哲学,提高哲学素养,进行哲学思维训练,是大学生“名副其实”的“经济”条件之一,是实现大学生心智成熟的重要通道。就此而言,大学的哲学课绝不是一门普通的课程,而是一门成就大学生的必要条件的特殊课程。

自觉研习哲学,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学生”。唯有如此,大学四年才不会虚度。